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应对增速换挡期的新挑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张 平

编者按 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仅定义了中国经济新阶段的新特征，其重要意义还在于指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适应“新常态”的关键，这对我们更好地应对增速换挡期的新挑战有着重要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生产、要素的禀赋、市场、资源约束、风险和宏观调控九个趋势性变化定义了新常态，把握了中国未来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向高效均衡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它具有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转换中所具有的持续结构性改革和政策性调整特征。

一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了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有着明显的结构性加速向着结构性减速转换的特征。赶超过程中的结构性加速因素，如人口红利，二元经济下的廉价劳动力，政府产业政策干预下的工业化发展，全球大繁荣带来的需求等积极因素逐步结束，结构性加速因素变成了减速因素，只有体制与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变原有的增长方式，向着经济增长新阶段转换。

这一转换过程必然伴随着：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结构调整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的比重高低调整了，而是更为广泛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首先在于如何重振内需，即通过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其次内需调整过程中不断提升消费需求比重，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第三，进行现代产业部门的优化转型升级，促进现代产业部门持续提升产业效率，而不是简单地关注产业结构比例；第四，区域结构调整将以跨行政区划进行城市群的发展为新带动，如京津冀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超大城市群等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空间布局启动，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

提高要素供给质量成为提高竞争力的新常态。低成本土地、低工资劳动力、低环保成本、低税收成本等低成本的要素供给推动规模化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压低土地成本、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应该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通过提高要素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才能持续改进中国的竞争力，这也要求改革要素的供给与配置机制，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改善供给机制和激励要素供给质量提高，才能有效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常态的关键。传统赶超过程中过度依赖于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让位于市场配置资源，打破政府干预配置资源成为改革的一条红线，这里包括大量的改革内容，如要素价格调整，国企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政府行政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多方面，这些改革将成为现阶段最为重要促进经济高效均衡发展转型的核心内容。

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包含了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持续改革三个方面。转换的方向就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型增长。

一是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部门的过渡，农业部门的劳动效率与现代部门的劳动效率一致，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结构调整更主要依靠市场进行“出清”调整。我国当前完成了产业结构增加值的现代化转化，但没有完成就业配置现代化的转化，农村部门就业仍占30%，很多农民完成了职业转换，但没有完成身份转换，中国仍处在中国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没有完全成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状态。改革仍然是这一阶段重中之重的任务。

三是经济增长贡献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源的提升，而不是要素的不断递增的投入。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不断下降，人力资源错配，大量优质人力资源向非市场部门集中，这难以形成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解决好技术进步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本的配置机制才能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

上述三个方面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转换，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政策激励是重要的方面。“新常态”转向真正的新阶段，需要自我的不断改革和结构调整。

二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要义就是利用好经济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称之为“减速治理”。只有利用减速压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最佳的“减速治理”时期，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在增速换挡期过程中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但这一理论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特别是亚洲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项目或企业都不愿意被清洁，反而抗拒减速清洁，形成所谓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将创新企业所需资源吸入，而减低了创新活力。因此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增长机制。韩国就是一个“减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近乎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的“减速治理”包含着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让减速成为一个“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鼓励创新，为新体制建设铺路。

首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政府长期通过“支持”的干预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进行配置，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我国统一市场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问题。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三是打破“条块分割”的现状，纵向和横向的行政干预形成的条块分割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使得区域间贸易量减少或者萎缩，分工无法深化，创新难以外溢；四是强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存量释放，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当前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多为效率较低的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一倍以上，因此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

三是推进金融改革，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和政策周期不同步对中国冲击。当前，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同时风险也在加大，而中美经济周期和政策激励不同步等问题会带来冲击，因此金融改革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人民币币值成为重要的政策。

总而言之，减速治理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要将宏观政策激励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

以改革精神建美丽乡村

中共贵州安顺市委书记 周建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目前仍是突出“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仍然在农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意义重大。这为建设美丽乡村指明了方向。建设美丽乡村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抓手，乡村建设不仅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突出独特的村居风貌、传统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

近年来，安顺市探索出一条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环境改善相结合的道路，安顺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强田园生态型村落建设，形成现代农村风格；以休闲农业为重点加强观光体验型村落建设，培育农村新型业态；以社区管理为重点加强村镇型村落建设，率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强田园生态型村落建设，形成现代农村风格。一是立足县域，因地制宜，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风格，统一建设”的要求，做好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坚持“村村有规划”，充分挖掘每个乡镇、每个村庄的人文、生态等特色内涵，打造“一村一景、一村一品”；强化项目谋划和资金配套，做到美丽乡村建设有规划指引、项目支撑。充分征求群众意见，让群众了解规划、支持规划，确保规划落地实施。二是因地制宜引导发展特色产业。近年来，安顺的美丽乡村建设还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引导发展特色产业，形成长远发展支撑。加快推进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坚持“一乡一特，一村一品，多品共生，长短结合，配套发展”的原则，突出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布局，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做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

以休闲农业为重点加强观光体验型村落建设，培育农村新型业态。我们坚持外在美与内在美有机结合，力求做到神形不离、神形兼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注重结合安顺本地人文、历史、民族、自然、地理等实际，彰显历史文化元素，努力建造独有的屯堡民居、苗族民居、布依族民居等地方特色明显的民居。对有保护价值、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村寨和民居加强维护，修旧如旧，避免盲目以拆代建。坚持按照“宜散则散，宜聚则聚，聚散依规，一村一面、一村一特、一村一品”的原则，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突出安顺各地建筑文化风格。对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屯村、七眼桥镇本寨村和平坝县天龙镇天龙村、普定县马官镇马官村、镇宁自治县城关镇高荡村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重点保护的同时，按照历史文化风貌加强规划编制，对现存的古水利工程、古建筑等进行保护性开发，打造具有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特色和乡村旅游支撑的美丽乡村。

以抓示范，发挥带动作用，形成典型引路效应。安顺在全市树立40个市级示范村，打造成美丽乡村建设的标杆。各县区在高速公路沿线、旅游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选出560多个基础条件好、干部群众积极性高的村集中打造，形成了更大的带动面，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由点成线及面，达到“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效果。同时，积极探索以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工作，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创新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子。

以社区管理为重点加强村镇型村落建设，率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是住房和环境的改善，也是文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更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近年来，我们围绕群众所需所盼还做了很多事情，如民主议事、资金互助、居家养老等等，率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往后，我们要继续以改革精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美丽乡村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农民真正“美”在心里。

理论动态

国防大学

本报讯 近日，由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武警后勤学院共同举办的“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暨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2014年年会”在天津召开。来自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破解制约和影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如何深化军民融合体制机制改革、如何谋求新常态下国防经济创新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要通过积极主动的战略筹划，把国防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相互促进、融为一体，形成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与会专家学者提出，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快发展，既为军民融合式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路子，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逐步形成在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空天、信息等关键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格局。面对新形势，要进一步完善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政府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等政策制度，确保军民融合式发展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甄 珍）

全国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活动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民政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养老产业和教育联盟主办，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承办的2014年全国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活动在京举行。对话活动从理论研讨、国内外交流和学生就业等环节上实现了养老服务“产教深度融合”。

与会专家学者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龄产业发展进入了“黄金期”。我们要把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使之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级的重要力量。同时，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外，老年群体的内部结构也正在发生改变，对养老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养老产业形势大好的时候，更要保持冷静理性，看到养老产业既有重大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养老产业要真正成为服务业的新亮点，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需要政府、市场等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市场要发挥主体作用，两者各就其位，互为补充，形成合力。

（裴珍珍）

首届中韩可持续经济技术国际学术论坛召开

本报讯 由中国科学院唐山科学发展研究院、河北联合大学、韩国仁荷大学等单位发起的中韩可持续经济技术国际学术论坛，日前在河北唐山举办。论坛主题为“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来自中韩两国十几所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及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专家以及企业家代表参加了论坛。

中韩可持续经济技术国际学术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唐山科学发展研究院、河北联合大学、韩国仁荷大学共同发起，从今年起将在中韩两国轮流举办，其使命是为这一领域的中韩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提供一个理论研究和技术成果交流的学术平台，共同探讨可持续经济转型和可持续技术推广的有效途径。

当天，由中国古玉器研究会主办，唐山市古玉器研究会、中科院中韩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中韩古玉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唐山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汇聚唐山，通过以赏玉寻根、交流最新研究成果为内容，共同探寻人类早期文明发展轨迹、增进文化发展自觉意识。

（吴 锋）

热点透析

加 发

宋雨河 武拉平

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加强信息服务十分关键。信息，简而言之，就是有用的消息。理论上而言，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公共信息，这类信息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即信息发布后，谁都可以使用，很难监督谁使用了或谁没有使用，也很难索取使用费用，只能由政府提供，企业不会参与这类信息的搜集和发布，比如天气预报、各个行业的基础信息等；另一类是非公共信息（即私人信息，或私人企业信息），这类信息不拟公开发布，有些属于商业秘密，只能由企业或生产者自身获取，然后用于其生产经营决策。

信息在农户生产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对于2亿多“小农户”，必须保证信息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农户手中，同时也要求农户能够利用好信息，这是“小农户”应对“大市场”的选择。近年来，针对个别农产品价格的较大波动，有些观点认为是由于农户不知道该种什么、种多少，只能“一窝蜂上，一窝蜂下”。有些人把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信息来源，总结为“看邻居”或“看过去”，或去年什么挣钱，今年就生产什么。实际上，这些认识是不全面的。即使信息完备，由于资源、技术、管理能力、决策能力、收入、需求、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价格仍然可能会波动。

理论上看，预期价格是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农民真正需要的是决策能力。这对于一家一户的小农户而言是很难的。因而，才出现当预期到价格上升时，风险偏好型农户就可能将其手头的全部资金或耕地等资源用于扩大生产，即使比较谨慎的农户也可能会扩大规模，这样就会带来下一步的供过于求，导致未来价格下跌。相反，在预期价格下跌时，又会做出相反的决策，导致未来价格上涨。这样放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上述现象涉及到小农户如何利用好市场信息，从而为决策服务的问题。作为地方政府，不可能为一家一户做决策，只能尽最大努力提供国内外更多的生产、需求、流通、价格等信息。

引导农户利用好市场信息，保证信息能为农户科学决策提供服务，应该成为地方政府信息工作的重要目标。

一是从“用得上”和“用得起”角度看。近年来，地方政府已经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加速了农村信息化建设，包括“四电一站”建设、三网融合建设等。农业部门也在一些地区试点了农村信息服务站，为农民提供以本地主导产品为主的、不同区域（本乡镇、本县、本省和全国甚至全球）的产品生产、产量和价格等信息，并不断提供未来行情走势的预测分析。

二是从“用得好”角度看。要鼓励农户联合，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经营。通过集体的力量，通过合作社中的“能人”效应，带动一家一户的生产和经营，变个体决策为集体决策，减少决策失误。政府不能代替农户做决策，但合作社可以“代替”农户做决策，指导农户扩大或缩小规模。相对而言，合作社可以更好地获取并分析利用相关信息。韩国的实践表明，合作社不仅是技术和营销的合作，在生产决策方面合作社也能发挥很大作用。

三是从决策失误的回避看。即使决策失误，形成产品“过剩”，政府也要通过储备补贴等方式的支持，让农产品能够“销得出、储得下”，同时争取能够让农户“出名牌、售高价”。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在农户自身综合能力没有得到较高提升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好服务，特别是农村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一方面，通过平台沟通供需双方，从而达成交易，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农产品鼓励农户或农民合作社经过简单包装或加工后，通过电子商务直接销售。

我们也必须看到，从长期来看，农户自己的决策能力必须提高，这固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要求不断加强对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市场经济知识、生产经营知识和信息知识的培训，提高其综合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本版编辑 裴珍珍